
从休克中复苏的中国政治改革

张 琢

〈ZHANG Zhuo, 爱知大学〉

历史运行如螺旋。

治乱循环，王朝更迭，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便是中国历史运行轨迹的体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中国大陆的统一，本来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创造了自清王朝瓦解以来难得的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而且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也的确开了一个好局面：到1952年的短短三年，中国大陆就恢复了被长期战乱所破坏的经济，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但是，好景不长。接着就被以毛泽东为领袖的执政者沿着农民粹主义的道路，以不断“革命”的方式，从“左”边转回到二千余年前的周秦时代：通过“三大改造”（即农业、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经济上，农业土地占有和生产方式回复到了西周的井田制（其中大片的土地是公田，房前屋后、田边地角的小块土地为自留地即私田）；工业，回复到了商周以来的官营手工业的方式；商业，亦完全为国家所垄断的禁榷制；政治上，毛泽东实现了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及成吉思汗的夙愿，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的地位，公然以“万岁”自居。社会控制达到空前严厉的程度。而文化专制的暴虐，更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朝的文字狱黯然失色。到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几乎被他拖回到了百废待兴的洪荒时代。

毛泽东逝世，“文革”收场，标志着中国传统农民运动的终结。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复出，发起了中共执政后的“二次革命”，拨乱反正，把共和国引向改革开放的新航程，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重新启动。

中国历史上，真正起到社会制度根本变革作用的改革有两次。

一次是公元前356年开始的商鞅变法，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反复曲折的激烈斗争，终于废除了既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确立起了皇帝中央集权以行政层级进行统治的制度。这种政治体制实际上一直延续到毛泽东统治的终结。其间虽经大小数百次农民造反、政变、改朝换代和具体制度上的调整、修修补补，但是个人专制独裁的根本体制并未改变。在这个延续二千余年的专制体制下，整合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力、物力，创造了中国的传统文明，直到近代才受到西方工商业文明的真正挑战。

第二次即是1978年启动的改革。这次改革，就其实质而言，是要在中国实现产业革命，建立现代民主制度。其现实的起点和运作，就是革除在毛泽东执政的时代，内承中国几千年皇帝集权专制的大传统、外加从苏联引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小传统而强化的制度积弊，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吸取、效法发达国家的成果和经验，摸索出通向经济繁荣、政治民主、人民幸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和发展理论的探讨已突破了毛泽东在1960年代初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局限，而认为全面的现代化的概念的内容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在内的系统工程，是一个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当时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者在发展战略的时序安排上，也力求诸方面的协调发展。

然而，由于社会发展的主客观要素条件的差异，中国现代化无论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近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25年的发展，无论是在空间地域方面、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利益的获得，还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大要素的推进，都是不平衡的、异步的。主观愿望与目标的同步性和协调性要求，与事实上的异步和非协调性发展，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发展战略和实践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过程。

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首先是由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从最低的求生愿望出发，自下而上，由暗化明，推动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运动，进而推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入、扩大，又将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上了日程。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指示：“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于是，在1986年7月1日中共建党六十周年纪念日，重新发表了邓小平在六年前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政界、理论界立即活跃起来。为加快政治改革步伐，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同年9月成立了以赵紫阳总理任组长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设政改办公室，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改革内容：党政分开、重视党的组织和党内民主、进一步下放权力、精简政府机构、改革人事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制。虽然这次政改因1986年底的学生运动及胡耀邦总书记下台事件受到一定冲击，但是邓小平在次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前仍郑重指出：“十三大实际上应该叫做改革、开放的大会，要加快改革步伐，深化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几年前就提出来了，但过去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这次才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中共十三大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长期性，其长远目标在于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政治体制。当时的具体做法，赵紫阳总书记提出了从两头入手：“一头从党内做起，从中央做起，中央从建立程序、制度、规则做起”；“一头从社会上做起，从基层做起。要保障基层民主，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广泛开展政治协商对话”。

中共十三大以后，赵紫阳力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是遇到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阻力和干扰，终于酿成1989年春的政治风波和“左”的旧势力的反弹，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的剧降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后退。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发表一系列讲话，总结了中共历史上屡受“左”、右之祸，而危害最大的主要是“左”。再一次扭转局面，给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以新的动力。次年，朱熔

基入主国务院，直到2003年任期届满功成身退。其间，中国的经济得以在克服内部体制的弊病和亚洲金融风暴的艰难险阻中迅猛推进，并在世纪之交成功与国际接轨，加入了WTO。

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改革和发展，现在中国社会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已由低收入的贫困状态上升到了世界中等水平的温饱和小康状态。但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却是进展缓慢。

不过，随着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外开放的扩大，国民的私生活的自由和民间言论自由仍有相应发展，逐步酿出了新一轮启蒙思潮，催促着政治体制改革重上征程。

社会结构的分化和重构、利益格局的变动，使重新活跃起来的思想讨论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时代特征。这也是我们这次讨论会“思想文化组”关注的内容。

经过十多年的休克、反思和酝酿，在中共十六次代表大会领导人换届之后，新任总书记胡锦涛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宗旨，于2003年9月29日进行的中共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总结历史经验，重新提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强调：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全局出发，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这是切实的，也是符合民意的。当然，中国政治改革的道路还将是漫长而艰难的。重要的是有不畏艰险的改革者，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在实践中开辟成功之路。